政治科學論叢 / 第 78 期 / 民國 107 年 12 月 / 頁 105-136

中小型國家的安全策略及其路徑演變：以塞爾維亞、亞美尼亞與烏克蘭爲例*

楊三億**

摘　要

本文集中在中小型國家的策略選擇及轉型研究，本文釐清哪些因素是影響中小型國家策略選擇的主要變因，由此理解這些國家爲何選擇此種策略選擇的起因。根據這些國家的初始定位及演進過程，本文將勾勒出中小型國家可能的策略變化，以此探索這些變化過程可能原因。本文首先假定影響中小型國家策略選擇的主要因素爲政治菁英遞嬗、經貿交流與區域安全威脅，這些因素在不同國家產生的效果不盡相同。其次，本文假定策略變化的軌跡可區分爲以經濟依賴爲主的經濟避險（Hedging for Profit）類型、以平衡威脅爲主的安全避險（Hedging for Security）類型、以及因內部分裂的政治暴力（Political Violence）類型，這三種類型分別代表中小型國家策略變化的基本架構。爲能更清楚說明這些基本類型的具體圖像，本文透過觀察塞爾維亞、亞美尼亞與烏克蘭三國具體案例，說明這三國策略轉變的多樣面貌及其與本文分析架構之關聯，最終並提出個案研究的經驗觀察。

關鍵詞：安全策略、塞爾維亞、亞美尼亞、烏克蘭

---

* DOI:10.6166/TJPS.201812_(78).0004

**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E-mail: sanyiyang@nchu.edu.tw。

收稿日期：107 年 2 月 26 日；通過日期：107 年 8 月 27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壹、前言：中小型國家安全研究發展脈絡

解釋國際關係格局的一個重要分析架構是權力的分配模式，國際體系因權力分配不均衡而使體系存在著大型國家與中小型國家等不同類型，大國經常主導國際體系運作，中小型國家則因國力因素，多受體系影響而被迫做出各式回應。大國因影響力大而常爲國際體系之主角，然擔任配角的中小型國家也有其重要性，中小型國家是否願意跟隨大國行動，很大程度受到內外部因素的影響。近期國內外學界對中小型國家研究漸趨重視，研究取材也相當多樣化，這是因爲眾多中小型國家是構成國際體系的大量行爲者，這些行爲者的行動取向、回應環境策略、以及策略選擇內在意涵等，都非常值得仔細研究。

在眾多與本文相關的中小型國家研究中，學術界對各次區域的中小型國家研究有著極大的興趣，例如本文關心的塞爾維亞常是研究對象，這個位於巴爾幹半島地區的國家，在冷戰時期扮演著區域穩定與否的關鍵角色。過去文獻多認爲冷戰時期的南斯拉夫是一個從屬於兩極對立體系下的共黨國家，不過重新檢視冷戰時期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y）與塞爾維亞的交往關係，當時雙方互不往來的對立看法並不正確，兩者是一種流動式的彈性調整狀態，也就是歐洲共同體並沒有因爲塞爾維亞隸屬共黨陣營而放棄交往。塞爾維亞在不同時期平衡蘇聯在巴爾幹地區的勢力，因而在不同階段採取彈性作爲，與歐洲共同體的交往就是一種策略，雖受冷戰對立局勢影響，但塞爾維亞展現的彈性做法讓該國在冷戰時期還能保有最大彈性空間，讓該國受強權競爭的負面影響降至最低（Zaccaria, 2016: 1-12；Szpala, 2014: 1-8）。受到強權夾擊的個案在東亞地區亦所在多有，例如在人數、土地面積與自然資源皆不如其他周圍國家的條件下，新加坡在充滿爭議的南海海域維護獨立自主，其中一個特色是採取軍事事務革新方式回應外界挑戰。該國透過軍事組織調整、組織目標與任務修訂等，積極建立不對稱打擊能力，其中一項作爲是在極有限的國防資源中積極向外採購戰略潛艇，作爲捍衛該國海域的主要依靠，以應付南海變化多端的局勢（Raska, 2016: 130-16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個案分析是中小型國家的重要研究方法，透過大量個案分析可找出不同國家安全策略特色所在，不過累積若干個案後，有相當多研究嘗試就性質相近（或相異）的個案進行比較分析，希望找出更多研究發現（薛健吾，2016）。觀察新加坡與臺灣的經濟成長與軍事整備面向，這兩國冷戰時期都採取以威權統治方式穩固政治秩序，但後冷戰時期兩國發展軌跡有所不同，新加坡仍堅持一黨獨大的統治方式，長期以來政府決策受內部變動因素影響較小，而臺灣的民主化發展路徑與新加坡不同，在面臨中國崛起過程，臺灣的民主化成爲海峽兩岸關係發展的重要變數，並且大幅影響了臺灣與中國的互動架構（Wu, 2016: 4-7）。國內政治的研究途徑是從內部分析這些國家回應外界環境採取的選擇，此種比較分析的研究方法可呈現不同國家爲何在特定時空採取特定安全策略，對那些地緣因素或國家稟賦相似的中小型國家，比較分析法具有相當的解釋力。

中小型國家安全研究另一特色是多元化的國際參與，當前全球化程度讓多數國家的跨國聯繫較過往緊密許多，經貿因素是其中重要考量。中小型國家思考與大國經濟交往時，多半集中在是否應與對抗強權擴大經濟交往？是否應接受對抗強權的市場誘因？如果接受，那麼可能的風險又將如何？若干研究指出歐盟的鄰近國家對是否加入歐盟也有相同看法，因爲他們擔憂加入歐盟意味著失去更多的國家自主權。另外，對那些已加入歐盟但未使用歐元的國家，採納歐元代表經濟主導權轉移到歐洲中央銀行，這些疑慮說明中小型國家對經濟安全的思考與擔憂（Koyama, 2016）。中小型國家第二個多元化參與國際活動的原因，在於這些國家國力有限，因此參與國際政治、經濟或社會活動時通常有「效率導向」考量，他們通常會傾向於參與那些對國家發展較有幫助的國際組織，藉此解決國內爭議或提高國家安全（Hey, 2003: 5；Joenniemi, 1998: 61-62）。

從上述討論來看，這些中小型國家重視區域安全或經濟議題、不斷強化自身安全與繁榮的原因是可理解的，所以分析哪些因素決定中小型國家當前策略選擇的問題，是當前研究核心所在。先前研究指出從前蘇聯獨立出來的眾多歐俄中間地帶新興國家，西方支持程度與經濟發展是兩大重要指標，越能獲得西方支持與經濟能力越強的國家，採取對俄抗衡的態度就越明顯（吳玉山，1997a；1997b）。處在歐俄中間地帶的國家選擇抗衡或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從，關鍵是他們與歐洲區域安全體系的連結，透過觀察這些國家與歐盟、北約、歐亞經濟聯盟的親疏遠近關係，可勾勒出這一群組國家的抗衡或扈從走向。此種將區域安全體系納入中小型國家的策略選擇，是一種抗衡的次指標（軍事與經濟整合）分析意涵，透過此種方式，本文可更明確的定位這一群組國家策略走向選擇（楊三億，2017）。

基於以上討論，本文第一個研究目的在於釐清影響中小型國家策略選擇的主要變因，從結構性的內外部因素角度來看，本文認爲制度性因素，也就是政治菁英或執政者的遞嬗過程是影響中小型國家安全策略選擇的重要因素，蓋新上任的政治菁英是否延續前任執政者的安全策略，將很大程度說明該國安全策略的延續或轉型。其次，經貿交流是當前中小型國家對外關係發展的重要標記，中小型國家的主要經貿交流或重要戰略物資的貿易對象，通常代表該國與強權間友好關係。再其次，影響中小型國家策略選擇的另一個重要因素乃是該國是否存在區域安全的威脅來源，如領土與國防爭議。本文認爲上述三種因素影響中小型國家的策略選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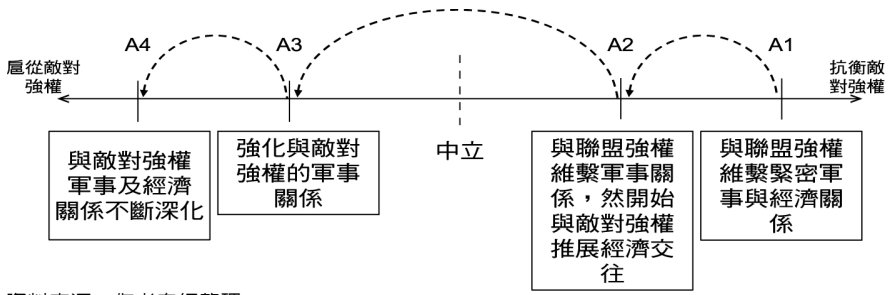
其次，本文假定中小型國家的策略選擇不會是固定不變的選擇，策略轉變是眾多中小型國家安全策略的重要特色。策略出現轉變意味著這些國家相對位置變化，相對位置出現變化代表行爲者運動軌跡改變，亦代表這些國家因受外界壓力而被迫產生回應，中小型國家對強權的政策回應就代表這些國家與強權親疏遠近關係的可能變化（Sweeney & Fritz, 2004: 446-447；Schweller, 1994: 74；Larson, 1991: 85-87）。更進一步說，這些變化代表中小型國家抗衡與扈從的對象發生變化。從本文研究主旨來看，中小型國家安全策略在面臨強權競逐過程，無論是主動或被動的回應強權壓力時，可能產生的結果不外乎是更親近強權或更疏離強權，本文假定策略轉型的軌跡可區分爲以經濟依賴爲主的經濟避險（Hedging for Profit）類型、以平衡威脅爲主的安全避險（Hedging for Security）類型、以及因內部分裂的政治暴力（Political Violence）類型，這些構成中小型國家策略選擇的因素與轉型過程分析，本文將在第貳與第參部份進行說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貳、中小型國家的安全策略選擇

爲能了解中小型國家安全策略選擇變化，本文先從這些國家策略選擇的原生位置進行討論，從原生位置觀察這些國家的變化軌跡。一般而言，理解中小型國家安全策略選擇起點爲抗衡或扈從，假定這些國家對特定強權採取抵抗或順從的態度。觀察國內外文獻討論抗衡或扈從起點時，這些策略選擇基本假定都是外部環境存在一個對中小型國家具敵意的強權，強權透過軍事、政治或經濟力量影響這一些國家，而這些國家選擇抗衡或扈從來回應外在威脅（Waltz, 1979: 126；Walt, 1985: 15-24；1987: 5-6；Sweeney & Fritz, 2004: 428-449）。抗衡與扈從的基本形式很容易理解，但如果把軍事與經濟政策納入抗衡與扈從架構來看，中小型國家的策略變形就變得更爲多樣，這些國家可以採取軍事抗衡且經濟抗衡的態度，或軍事抗衡但與潛在敵人經濟整合的政策取向。爲求更清晰的理解這些選項，本文把抗衡與扈從視爲光譜兩端，請參閱圖 1：

圖 1　中小型國家安全策略選擇線性變動軌跡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在圖 1 中，本文首先說明光譜的各項標點，A1 在本圖中被假定爲原生起點策略，代表的是中小型國家與聯盟強權（Allied Powers）的緊密軍事與經濟關係，這個選項代表中小型國家採取全然抵抗敵對強權（Hostile Powers）的抗衡選項，不與敵對強權發展政軍關係。A2、A3 與 A4 代表中小型國家從抗衡的光譜右端開始轉向，開啓與敵對強權交往的各式策略（Vaicekauskaitė, 2017: 7-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向 A2 選項移動的意涵在本文中代表中小型國家仍維持與聯盟強權的緊密互動關係，但開始與敵對強權發展經濟交流。中小型國家與敵對強權推動經濟交流的原因很多，可能出於敵對強權快速經濟成長，使得中小型國家爲求經濟利益而擴大交往；另外，相對於敵對強權的崛起，中小型國家爲能持續經濟發展，因此展開了與敵對強權的經濟交往政策。

向 A3 選項移動的意涵在本文中代表中小型國家鬆動了與聯盟強權的軍事關係，開始尋求與敵對強權的軍事交往。中小型國家出現與敵對強權發展軍事交往的現象，可能的因素來自於次區域的安全關係，中小型國家因安全威脅而與區域的其它國家保持緊張關係，使得這些國家爲尋求解決之道而與敵對強權進行軍事交往、找尋奧援以解決區域衝突，從次區域的觀點來看，這很類似一種小區域的戰略三角模式。

向 A4 選項移動的意涵代表的是中小型國家向敵對強權全然扈從的選擇，由於中小型國家積極在軍事與經濟各方面強化與敵對強權的交往關係，使得中小型國家逐漸拋棄對抗敵對強權的策略、改採明確扈從敵對強權的作法。假使中小型國家與敵對強權完成軍事與經濟的高度整合狀態，此時即可改稱敵對強權爲聯盟強權，中小型國家重新定義聯盟或敵對的對象所在，此時中小型國家或有可能開啓新一輪的線性調整（Kang, 2009: 7；Aydin, 2004: 1-22；Schweller, 1994: 74）。

當中小型國家的策略選擇進行改變、抵達特定位置，這一群國家的策略選擇也就隨之穩固，本文將上述相對位置的變動給予定性描述，也就是給予這些相對策略位置的名稱，由此說明中小型國家策略選擇的模式所在。本文將 A1 視爲「抗衡」，也就是中小型國家與聯盟強權維繫緊密關係的策略作爲，此種作爲顯示中小型國家採取各式政策抵抗敵對強權的表現。在這個階段，聯盟強權無論在政治或經濟關係的表現上都是中小型國家最重要的合作夥伴，本文認爲這即是抗衡的策略選擇。

本文將 A2 視爲「經濟避險」，也就是中小型國家雖然仍與聯盟強權保持軍事同盟關係，但因經濟因素而採取了避險作爲。在這個階段可發現中小型國家與敵對強權的經濟關係出現變化，一般來說，這些變化可能表現在雙方進出口的貿易增加，或雙邊貿易中出現了特殊的戰略資源項目等。因進出口貿易增加而帶來的市場、技術或資金的依賴度上升，或者因戰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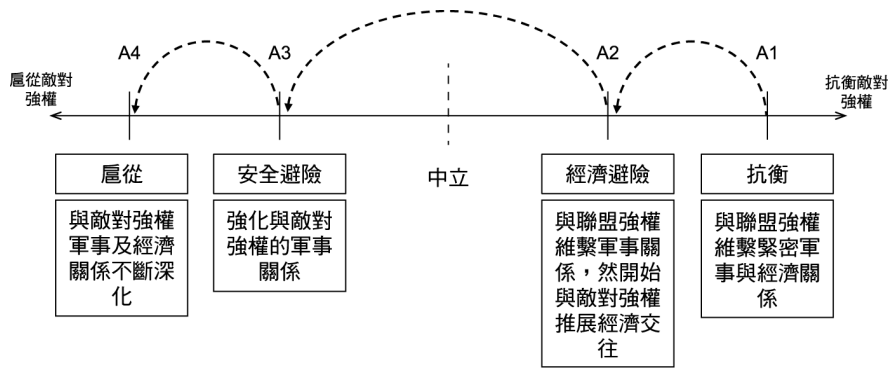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物資貿易的出現使得雙方貿易敏感度提升的現象，本文認爲這即是中小型國家採取經濟避險的策略選擇。

本文將 A3 視爲「安全避險」，也就是中小型國家開始與敵對強權進行軍事聯繫，以合作方式解決區域安全挑戰，此項舉動顯示中小型國家安全策略出現變化，視區域安全危機挑戰高於敵對強權威脅，認爲與敵對強權合作可能可以遏制區域危機，此種重新定義安全威脅來源，本文稱之爲安全避險的策略選擇。

本文將 A4 視爲「扈從」，也就是中小型國家由對抗敵對強權的態度轉化爲扈從敵對強權的策略選擇，決定與敵對強權在軍事與經濟各方面進行深度整合。一旦中小型國家完成此策略階段目標，敵對強權也就轉爲聯盟強權的角色，並且隱含中小型國家策略轉型出現新一輪的可能，請參閱圖 2。

圖 2　中小型國家安全策略選擇類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上述安全策略選擇的中立概念是一個較特殊的選項，本文爲求集中問題意識與簡約化核心議題，因此將於其他篇幅另行分析中立國的安全策略選擇，此處暫不討論。此圖主要說明的是中小型國家原先從抗衡立場向扈從立場轉化的動態過程，圖 2 所示之抗衡、經濟避險、安全避險、扈從等策略及其轉變方式，爲線型的常態轉變過程，此種線型轉變有如實驗室中的模擬情境，雖有助於理解中小型國家的策略轉變，然在眞實世界中多數國家的轉型並非如此線性般的固定，後文將強化對此模型的修正。

本文認爲影響中小型國家安全策略變遷的主要因素來自於政治精英遞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嬗、經貿依賴與區域安全威脅。從國內政治權力結構來看，無論民主化程度高低爲何，政治菁英的遞嬗是影響中小型國家安全策略選擇的重要因素，執政者的變動通常是該國安全策略是否轉變的重要觀察，多數中小型國家的合法轉型（選舉）或非法手段（革命），很大程度的影響了該國安全策略的延續或轉型。其次，經貿交流或依賴是中小型國家抗衡或扈從發展的重要參考，中小型國家主要經貿對象通常代表該國與強權的關係，甚且戰略物資或人力市場的開放與否也會影響兩國友好程度。最後，中小型國家的區域威脅來源是影響這一群國家策略選擇的另一個重要因素，中小型國家如與鄰近地區的其他國家有著領土或國防安全的各式爭議，那麼此時安全威脅的最重要來源將以鄰國爲優先，敵對強權的存在有可能成爲解決區域衝突的另一管道，因此，本文將從上述三種因素出發，分析影響中小型國家的策略選擇。最後，本文將從客觀世界尋找經驗基礎，再由這些基礎構建策略轉型的軌跡。本文討論的客觀世界轉型案例將從歐俄中間地帶國家著手，並選定塞爾維亞、亞美尼亞、烏克蘭三個國家作爲觀察對象。

參、塞爾維亞、亞美尼亞與烏克蘭的安全策略選擇

後冷戰時期中東歐國家的策略選擇在歐洲東西陣營權力競爭夾擊下，這些國家親歐或親俄政策走向，有著重要的研究意涵，本文擇塞爾維亞、亞美尼亞與烏克蘭三國作爲觀察個案，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

第一，從歐洲安全地緣政治角度來看，這三個國家都是冷戰時期結束後的歐俄中間地帶群組國家，這一群組國家處於權力填補過程狀態，同受東西方強權競爭，是安全策略轉型絕佳觀察對象。

第二，從次區域地緣政治角度來看，這三個國家所處的地緣政治區分屬巴爾幹半島、高加索與東歐地區，巴爾幹半島素爲歐洲安全火藥庫，歷史上的第一、二次世界大戰與冷戰結束後的種族衝突，巴爾幹半島常爲關注焦點；高加索與東歐地區則是當前歐洲衝突熱點，亞美尼亞與鄰近國家以及烏克蘭危機是歐洲安全隱憂所在，這些國家所在的衝突區域與安全策略選擇，足具代表性。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第三，從這三國與當前歐洲安全體系關係來看，這三國分別代表已經加入歐亞經濟聯盟的亞美尼亞、歐洲聯盟候選國的塞爾維亞，以及尚未加入歐亞經濟聯盟、歐洲聯盟或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烏克蘭，這些國家與其他已經加入歐盟的中東歐國家不同，多數歐洲會員國策略選擇自 1991 年起多已定錨，也就是在親歐或親俄策略上採取明確抉擇，而塞、亞、烏三國與前述國家發展軌跡不同，這三國與歐／俄關係以及策略選擇變動，是本文探討主要目的。

一、塞爾維亞

塞爾維亞位居歐洲巴爾幹半島地區，人口約 700 萬人，境內以塞爾維亞人爲人口最多的民族，約佔 83%；其於如匈牙利人（3.5%）、吉普賽人（2.1%）、波士尼亞人（2%）等。冷戰結束之際，南斯拉夫分裂成塞爾維亞、門地內哥羅、斯洛維尼亞、克羅埃西亞、馬其頓、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及科索沃等國，這些國家的獨立過程極爲血腥，自 1991 年起塞爾維亞與斯洛維尼亞、克羅埃西亞、馬其頓、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聯邦相繼陷入內戰，並導致大規模死傷。塞爾維亞以南斯拉夫繼承者自居，視其他國家獨立爲對南斯拉夫的背叛，因此採取武力方式鎮壓分離運動。由於南斯拉夫的分裂過程衝突不斷，衝突過程塞爾維亞頻遭外國軍事力量入侵與轟炸，1991 年至 2006 年是塞爾維亞陷入混亂的年代，一方面塞爾維亞內部有著嚴重的內部衝突，另一方面又受到強權美國的轟炸，因此國家極端不穩定。

2006 年塞爾維亞國家發展進入新階段，該國前總統米洛塞維奇（Slobodan Milošević）因遭控進行種族屠殺罪嫌被引渡至海牙「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 ICTY）進行審判，同時於當年病逝於牢房，米洛塞維奇的入獄標誌著塞爾維亞戰爭階段落幕，回復到較爲穩定的國家狀態。另外，2006 年也是塞爾維亞國內憲政秩序的重要起點，塞爾維亞與門地內哥羅組成的聯邦於 2006 年 5 月 21 日宣布解散，塞爾維亞、門地內哥羅兩國宣布各自獨立，自此兩國互不隸屬，至此塞爾維亞安全策略選擇排除其他民族干擾。本文選擇以 2006 年作爲觀察塞爾維亞的安全策略選擇起點，從這個時期開始理解塞爾維亞的策略選擇（楊三億，2012：242-24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個影響 2006 年塞爾維亞獨立後親歐或親俄的策略選擇因素是科索沃議題，塞爾維亞對科索沃和門地內哥羅分離主義的態度不同，塞爾維亞對前者獨立採極端反對態度，2017 年塞爾維亞仍未承認科索沃爲獨立國家，這個因素其來有自，科索沃爲尼曼吉奇王朝（Nemanjić dynasty，西元 1166-1371 年）首都，在塞爾維亞史籍記載，尼曼吉奇王朝是塞爾維亞人的古王朝，科索沃因此爲塞爾維亞古都。在濃厚的民族主義情節影響下，塞爾維亞堅持對科索沃擁有主權。另一個造成塞爾維亞與科索沃對抗因素是巴爾幹半島的泛斯拉夫主義（Pan-Slavism）與大阿爾巴尼亞（Greater Albania）的對抗。科索沃雖僅 180 萬人，然境內 95% 以上爲信奉穆斯林教的阿爾巴尼亞裔，與信奉東正教的塞爾維亞斯拉夫裔迥不相同。1990 年代米洛塞維奇對其它前南斯拉夫加盟共和國分離份子與伊斯蘭教徒的種族屠殺，使得科索沃更堅決希望脫離塞爾維亞而獨立（Rieber, 2015: 951-959）。

科索沃問題雖甚爲困擾塞爾維亞，然 2008 年科索沃正式宣布獨立後卻使得科索沃問題在塞爾維亞國內的影響力下降，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近 200 萬的科索沃人劃分出塞爾維亞領土，這使得塞爾維亞的內部種族爭議頓時受到緩解。時任塞爾維亞總統的 Boris Tadić 於科索沃宣布獨立時表示堅決不承認科索沃獨立，但他卻同意與科索沃民選政府進行談判，就科索沃邊界、境內少數民族、財產歸屬與戰爭補償進行協商，並與支持科索沃獨立方案的歐盟就「穩定與聯繫協定」（Stabilization and Association Agreement, SAA）的簽署進行磋商。[1] SAA 代表歐盟與西巴爾幹半島地區政經與區域合作基礎，是一個涵蓋政治與經貿合作的廣泛區域合作架構，也是西巴爾幹半島國家開啓入盟談判的重要起點，但其條件爲塞爾維亞須配合 ICTY 訴求、協助逮捕戰爭疑犯進行審理。Tadić 爲求能順利與歐盟開展關係，因此排除困難配合 ICTY 追緝疑犯要求，Goran Hadžić 爲名單上

[1] 2006 年塞爾維亞與門地內哥羅分離後的首任總統塞爾維亞採雙首長制，總統直選 5 年一任且連選得連任一次，主要負責國防與外交事務。Boris Tadić 所屬政黨民主黨爲 90 年代期間反對米洛塞維奇的主要政黨，塔吉奇於塞爾維亞與門地內哥羅獨立公民投票後亦親赴門地內哥羅顯示支持歐盟和解方案之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最後一位遭通緝的疑犯（2011 年 7 月到案），因此 Tadić 任內一方面配合 ICTY 與歐盟的訴求，另一方面推動 SAA 簽署與開啓加入歐盟的正式申請（Maki, 2008: 47）。繼任 Tadić 的塞爾維亞總統 Tomislav Nikolić 繼續與科索沃進行談判，就雙邊關係正常化的各式子議題（如遷徙自由、學歷認證、貿易優惠、邊界劃分等）繼續協商，雙方並於 2013 年 4 月達成協議，給予居住在雙方邊界少數民族自治權。

歐盟在塞、科兩國和解問題上扮演重要角色，主因是塞爾維亞加入歐盟的進程規畫，近年來塞爾維亞加入歐盟進程難有進展，塞爾維亞自 2009 年申請加入歐盟、2012 年獲得歐盟候選國地位後，歐盟與塞爾維亞 2017 年入盟談判僅開啓全部 35 章中的 8 章，完成談判者僅 2 章（European Commission, 2016），進度可謂緩慢。[2] 進度雖然緩慢，但歐盟與塞爾維亞的經濟交流卻逐年升溫，自 2006 年起，歐盟與塞爾維亞的年度貿易額呈現高度增長趨勢，年度貿易額自 2006 年的 60 億歐元增長至 2008 年近 100 億歐元，2 年間增長近 60%，成長幅度不可謂不大，且塞爾維亞與歐盟的貿易呈現大幅順差，爲塞爾維亞創造外匯之最大來源（European Commission, 2017: 3）。

由於 2006 年後塞爾維亞的政治發展與前總統米洛塞維奇有極大的差異，改以加入歐盟爲國家最高目標，同時還採取了大規模的各式親歐策略作爲，在此種策略作爲下，一系列的親歐遠俄作爲符合本文抗衡敵對政權的假定，以 2006 年起塞爾維亞安全政策選擇的原生起點乃是爲求加入歐盟的親歐／抗俄策略，請參閱表 1 與圖 3 綜合整理。

[2] 歐盟與塞爾維亞依序開啓入盟談判，爲第 32 章（財政管制）、第 35 章（塞－科關係正常化）、第 23 章（司法與基本人權）、第 24 章（正義、自由與安全）、第 5 章（公共採購），第 25 章（科技）、第 20 章（企業與工業政策）、第 26 章（教育文化），目前僅完成第 25、26 章談判。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1 2006 年後塞爾維亞歷任總統

總統	在職時間	所屬政黨
Boris Tadić	2006/6～2012/4	Democratic Party
Slavica Đukić Dejanović	2012/4～2012/5	Socialist Party（代理）
Tomislav Nikolić	2012/5～2017/5	Serbian Progressive Party
Aleksandar Vučić	2017/5～至今	Serbian Progressive Party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圖 3 塞爾維亞 GDP 成長率（2006-2016 年）



資料來源：The World Bank (2006-2016a)

二、亞美尼亞

亞美尼亞是一個位處高加索山脈區域的小型國家，人口約 300 萬人，98% 以上人口由亞美尼亞人組成，主要宗教信仰爲偏向東正教的亞美尼亞使徒教會（Armenian Apostolic Church）。關於亞美尼亞的宗教起源有許多傳聞，其中一個較爲知名的是聖經創世紀諾亞方舟的故事，傳聞方舟在大洪水退去後，於當前亞美尼亞的亞拉拉特山（Mount Ararat）靠岸，從而開展人類與其他生物繁衍。不論傳聞是否爲眞，亞美尼亞自西元 301 年起皈依基督信仰，以及被伊斯蘭文明所環繞（西方的土耳其、南方的伊朗、東方的亞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塞拜然）的特色，讓亞美尼亞歷史上與週邊國家交流非常複雜，多年來亞美尼亞與週邊國家衝突不斷，使得亞美尼亞目前存有諸多安全挑戰（Suny, 1993: 3-12）。

亞美尼亞獨立初期與莫斯科保持距離，這可從亞美尼亞宣布獨立與參加獨立國家國協時間點來看。亞美尼亞於 1990 年 8 月 23 日宣布獨立，這個時間在所有宣布獨立的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中是最早的，其次是亞塞拜然的 1990 年 8 月 30 日，其餘國家（如白俄羅斯、喬治亞等）皆晚至 1991 年才宣布獨立。亞美尼亞加入獨立國協時間爲 1991 年 12 月 21 日，亦晚於白俄羅斯、烏克蘭等國；此外，相較於亞塞拜然、白俄羅斯、烏克蘭等國從俄羅斯進口石油與天然氣，亞美尼亞獨立初期也未從俄羅斯進口能源，除中亞的哈薩克與吉爾吉斯外，亞美尼亞爲當時唯一未從俄羅斯進口石油與天然氣的歐洲國家（Brzezinski & Sullivan: 1997: 777）。相較於其他前蘇聯共產國家，亞美尼亞獨立初期的單一民族特色、昂揚的民族認同、與俄羅斯的低度能源依賴關係，亞美尼亞有可能是高加索地區遠離俄羅斯影響力的代表，亞美尼亞 1994 年後的經濟成長率表現亮眼，也更增加了此一可能性（Brzezinski & Sullivan: 1997: 782）。

亞美尼亞除有相對堅強的獨立意識與低度能源依賴關係外，亞美尼亞第一任總統 Levon Ter-Petrosyan 扮演重要因素，Petrosyan 投身政治主因是納哥諾－卡拉巴赫地區（Nagorno-Karabakh，以下簡稱納卡）議題所致，他成立「大亞美尼亞民族運動」（Pan-Armenian National Movement）政黨並積極投入納卡爭議，推動納卡地區獨立後再加入亞美尼亞目標。他曾因該事件短暫入獄，出獄後成爲該運動領袖，並於 1991 年順利當選第一任總統（Mirzoyan, 2010: 30-31；Brzezinski & Sullivan: 1997: 223-224）。納卡地區是一個現存於亞塞拜然境內、但居民多爲亞美尼亞人的土地，蘇聯瓦解時該地爲亞塞拜然所掌管，然 Petrosyan 於 1991 年支持該地宣布獨立，兩國因此進行長達 3 年的戰爭（Harutyunyan, 2009: 4-12）。觀察亞美尼亞 1991 年獨立後的策略選擇，該國從相對獨立於俄羅斯的安全環境但很快的轉向扈從俄羅斯作法，此種策略作爲的原生起點是一種從遠俄但快速轉向扈從的發展，請參閱表 2 與圖 4 綜合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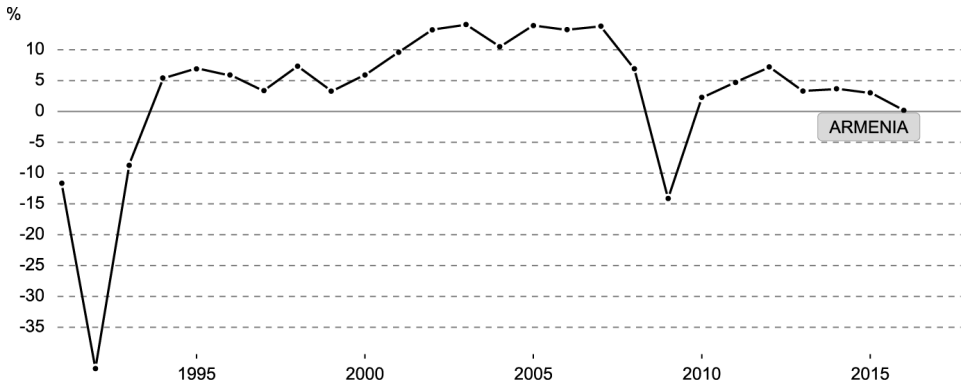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2 1991 年亞美尼亞獨立後歷任總統

總統	在職時間	所屬政黨
Levon Ter-Petrosyan	1991/11～1998/2	Pan-Armenian National Movement
Robert Kocharyan	1998/2～2008/4	Independent
Serzh Sargsyan	2008/4～2018/4	Republican Party
Armen Sarkissian	2018/4～至今	Independent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圖 4 亞美尼亞 GDP 成長率（1991-2016 年）



資料來源：The World Bank (2006-2016b)

三、烏克蘭

在本文案例的三個國家中，烏克蘭是當前唯一一個同時與歐盟會員國和俄羅斯領土接壤的國家，這個現象使得烏克蘭成爲最受矚目的國度。由於烏克蘭地處交界，因此該國有強烈的歐洲東西文明特點，歷史上俄羅斯與波蘭曾締結安德魯索夫條約（Andrusovo Contract）並商定以聶伯河爲界，開啓了不同國家治理烏克蘭的格局；另外，烏克蘭宗教信仰也呈現出東西迥異態勢，烏克蘭東部以東正教信仰爲主（涵蓋 Ukrainian Orthodox Church of the Moscow Patriarchate-UPTS MP, Ukrainian Autocephalous Church 以及 Ukrainian Orthodox Church Kiev Patriarchate-UPTS-KP 等幾個支派），西部則以烏克蘭希臘天主教教會（Ukrainian Greek Catholic Church）爲主流（趙竹成，2017：103-104）。除宗教外，烏克蘭的民族組成和語言使用也有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當分歧，越往東部使用俄語的人口越密集，越往西部使用烏克蘭語的人口也越集中（趙竹成，2017：104-107）。這些宗教、語言、風俗習慣差異，隨政治競爭過程不斷加大，烏克蘭國家認同也就難有共識，政治歧見也就隨之加大（Osipian & Osipian, 2012: 616-642）。

烏克蘭安全策略選擇受到內部社會的分裂影響，不容易有一個固定的路線可供解讀。烏克蘭 1991 年 8 月 24 日宣布獨立，這個時間點是 1991 年 8 月 19 日蘇聯保守派人士發動政變後的 5 天，烏克蘭獨立後的第一任總統 Leonid Kravchuk 選擇與俄羅斯保持遠距關係，因獨立後的烏克蘭在諸多問題上（如黑海艦隊與克里米亞半島歸屬）與俄羅斯仍有歧見，擔憂俄羅斯屢對烏克蘭形成強大的邊境壓力。第二任總統 Leonid Kuchma 以降的歷任總統則在偏向俄羅斯或偏向歐盟的兩個極端遊走，克里米亞半島的塞凡堡（Sevastopol）租借給俄羅斯的任務分別在第二任總統 Kuchma 與第四任總統 Viktor Yanukovych 手上完成，但因 2014 年革命爆發使得克里米亞島脫離烏克蘭獨立、再次加入俄羅斯聯邦。

烏克蘭是所有前蘇聯加盟共和國除俄羅斯外人口與土地面積最大的國家，烏克蘭獨立時還與蘇聯存有諸多戰略資產與軍事武力爭議，因此 1991 年自 Kravchuk 宣布脫離俄羅斯獨立始，Kravchuk 即試圖採取親歐的策略選擇，此種策略是透過尋求與歐盟的交往以獲得來自美歐的援助，以此平衡原先俄羅斯在烏克蘭擁有的傳統影響力。觀察烏克蘭獨立後的安全策略原生起點，Kravchuk 保持獨立且遠俄的策略選擇具有抗衡的重要意涵所在，請參閱表 3 與圖 5 綜合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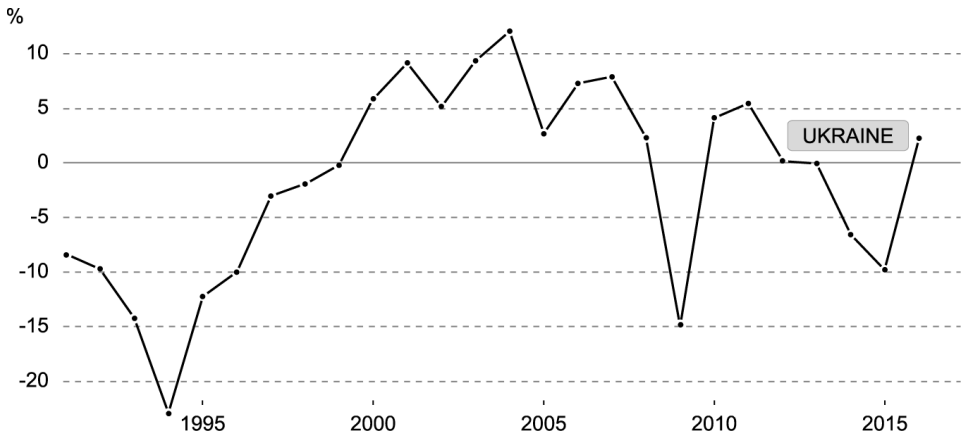
表 3　1991 年烏克蘭獨立後歷任總統

總　　統	在 位 時 間	所　屬　政　黨
Leonid Kravchuk	1991/8～1994/7	Independent
Leonid Kuchma	1994/7～2005/1	Independent
Viktor Yushchenko	2005/1～2010/2	Our Ukraine
Viktor Yanukovych	2010/2～2014/2	Party of Regions
Petro Poroshenko	2014/2～至今	Petro Poroshenko Bloc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5 烏克蘭 GDP 成長率（1991-2016 年）



資料來源：The World Bank (2006-2016c)

肆、安全策略轉型的詮釋項：經濟避險、安全避險與內部政治暴力

在初步分析塞爾維亞、亞美尼亞、烏克蘭三國內部安全環境與安全策略選擇後後，下文將針對這三國的轉型過程進行類型上的區分，以探討這三國策略轉型過程及其特色。

一、三國策略選擇模型

(一) 塞爾維亞：經濟避險（Hedging for Profit）的策略轉變

塞爾維亞 2006 年起的安全策略選擇以親歐爲起始，除前文提及擱置科索沃爭論外，塞爾維亞著手與歐盟簽署 SAA 與入盟申請案爲主要特色，這主要動力是來自於塞爾維亞的經濟結構。由於塞爾維亞主要貿易對象爲歐盟會員國（義大利與德國，以及週邊接壤的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塞爾維亞 2006 年後有很強的經濟趨力希望與歐盟保持密切合作關係，並循週邊國家經驗回歸歐洲，Boris Tadić 所代表的歐洲路線即爲此種思維展現。前述所及 2006 年後塞爾維亞與歐盟的雙邊高速經貿成長即爲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證。不過塔吉奇的回歸歐洲期望受到 2008 年的全球金融風暴及 2010 年歐債危機影響，塞爾維亞經濟成長由 2006 年的 4.9%、2007 年的 5.88%、2008 年的 5.36%，迅速的惡化爲 2009 年的 -3.11%、2010 年的 0.58%（World Bank, 2006-2016a）。受到與歐盟的雙邊經濟交流低迷影響，塞爾維亞與俄羅斯經濟交流卻持續增長，塞爾維亞與俄羅斯貿易進出口總額由 2006 年的 4 億美元成長至 2016 年的 8 億美元，10 年間增長兩倍，主要貿易項目爲農產品（26%）、機械工具（11%）、成衣（11%）與藥類製品（7.3%）等（Global Edge, 2018）。

除商品貿易外，塞爾維亞與俄羅斯的另一關鍵交流爲能源供應，俄羅斯 2007 年提出興建南流管線（South Stream pipeline）計畫作爲俄羅斯供應歐洲南部各國能源主要管線，這條管線經過的沿線國家爲保加利亞與塞爾維亞，再由分支管線供應羅馬尼亞、匈牙利、奧地利、希臘、義大利等國（魏百谷，2012：99-117）。俄羅斯選擇繞過烏克蘭，轉從保加利亞與塞爾維亞興建管線，可避免受烏克蘭衝突的影響，但這條高達 400 億美元的能源管線遭到歐盟調查，以不符合歐盟能源規章與涉嫌壟斷爲由而暫時中止（Baev & Overland, 2010: 1075-1090）。

另一方面，塞爾維亞與俄羅斯軍事關係顯得相對模糊，塞爾維亞未曾加入俄羅斯的「集體安全條約組織」（The Collective Security Treaty Organization, CSTO），且鄰近國家也幾乎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會員國，以及與北約保持友好關係的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已參加會籍行動計畫，membership action plan）。從軍事面向來說，塞爾維亞幾乎被北約會員國所包圍，這無疑使得塞爾維亞在巴爾幹地區的安全空間受到相當大限制（Frost, 2009: 83-1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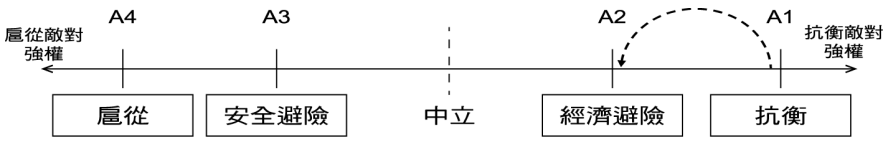
另外，再從塞爾維亞 2006 年後的歷任總統來看，Boris Tadić 的民主黨（Democratic Party）主導了與門地內哥羅的分離獨立、並且採取大幅度與歐盟親近的政策作爲；而 Tomislav Nikolić 與 Aleksandar Vučić 原屬塞爾維亞激進黨（Serbian Radical Perty）成員，激進黨原爲親俄／反歐政黨，惟 Tomislav Nikolić 與 Aleksandar Vučić 兩人退出激進黨另成立塞爾維亞進步黨（Serbian Progressive Party），以親歐爲主要標記，沿續 Tadić 策略。從塞爾維亞的策略選擇來看，無論 Boris Tadić 的民主黨、或是 Tomislav Nikoli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與 Aleksandar Vučić 的塞爾維亞進步黨，執政黨的輪替皆未出現親歐親俄策略選擇的變動結果，內部政治並非影響塞爾維亞策略選擇的因素；雖然塞爾維亞持續保持親歐的策略選擇，但因全球金融危機與歐債危機爆發以及國內能源市場需求，塞爾維亞選擇開展與俄羅斯的經貿交流。2013 年塞爾維亞總統 Tomislav Nikolić 與俄羅斯總統普丁簽署戰略夥伴協議，俄羅斯允諾提供 5 億美元的各式貸款、興建天然氣南線（south stream）管道、穩定的油源供應等，雙方開始全方位的交往。塞爾維亞的策略選擇顯示，政經與軍事分離可以雙軌同時運行，且獲得民意支持。

此種選擇與俄羅斯擴大經濟合作但不尋求軍事交往的策略，符合本文經濟避險的策略選項，所以 2006 年後塞爾維亞的策略選擇呈現由抗衡轉向經濟避險的變遷過程，請參閱圖 6。

圖 6 塞爾維亞安全策略選擇變動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二) 亞美尼亞：安全避險（Hedging for Security）的策略轉變

相較於塞爾維亞，亞美尼亞的策略選擇是另一種類型，從亞美尼亞與俄羅斯初期交往關係來看，經濟因素對亞美尼亞影響並不明顯，獨立初期始亞美尼亞希望採取的一個較獨立自主的安全策略，一直未放棄與歐盟經濟交流，當時主要經貿夥伴爲德國、保加利亞、荷蘭等國，俄羅斯並非亞美尼亞主要貿易對象。但因納卡戰事爆發、土耳其因故關閉與亞美尼亞邊界，使得亞美尼亞的陸路交通僅剩北方的喬治亞與南方的伊朗，這讓亞美尼亞頓時陷入孤立環境中。[3] 在受到週遭伊斯蘭國家包圍的情形下，俄羅斯

[3] 1914 年土耳其將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責任指向當時領土內的亞美尼亞人，控訴亞美尼亞人於戰爭過程與外國勢力勾結、意圖推翻當時的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因此 1915 年土耳其政府將亞美尼亞人集中管理、拘禁與流放，土耳其政府至今仍未就此與亞美尼亞進行和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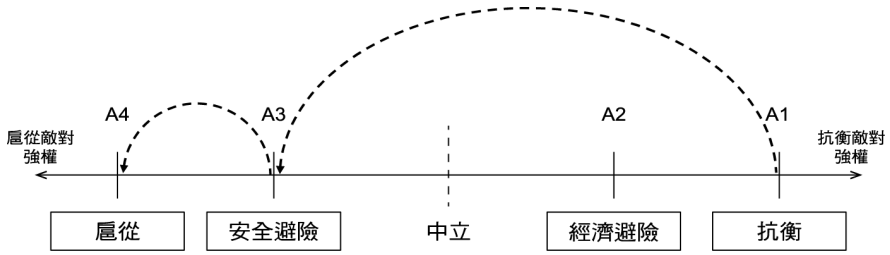
成爲亞美尼亞重要安全選項，亞美尼亞希望透過與俄羅斯軍事關係增強該國安全。也因此，在所有後共轉型的中東歐國家當中，亞美尼亞是除俄羅斯外唯二加入集體安全條約組織的國家（另一國爲白俄羅斯，俄羅斯在東歐地區的傳統堅強盟友），亞美尼亞也自願開放讓俄羅斯軍隊駐紮在該國領土（首都 Yerevan 與亞美尼亞／土耳其邊界久姆里 Gyumri）。

隨亞美尼亞與俄羅斯的政軍交往漸深，亞美尼亞逐步加深兩國經濟整合，第一個跡象是亞美尼亞擴大從俄羅斯進口能源，以及鋪設兩條天然氣供應管線（North Caucasus-Transcaucasus pipeline and the Mozdok-Tbilisi pipeline），2008 年起亞美尼亞每年約從俄羅斯進口 22 億立方公尺天然氣（Ananicz, 2013）。另外，亞美尼亞雖曾於 2010 年展開與歐盟的聯繫協定談判，但最終亞美尼亞決定選擇加入歐亞經濟聯盟與關稅同盟，拋棄與歐盟的整合。

從 Levon Ter-Petrosyan、Robert Kocharyan、Serzh Sargsyan 三任總統的發展來看，Petrosyan 之後繼任的兩位總統 Robert Kocharyan 與 Serzh Sargsyan 大抵遵循 Petrosyan 的策略選擇，Kocharyan 與 Sargsyan 立場親俄，執政時期經濟成長強勁，2013 年 9 月明白拒絕與歐盟聯繫協定（Association Agreement）與自由貿易協定（Deep and Comprehensive Free Trade Agreement）的談判外，更主動表達亞美尼亞加入歐亞經濟聯盟與關稅同盟的意向。所以亞美尼亞從獨立初期不依賴俄羅斯的政經環境、因納卡問題而很快的倒向俄羅斯後，就決定了其至今策略發展的方向。本文發現亞美尼亞與俄羅斯的經濟交往是隨著政軍關係結盟而深化的，亞美尼亞先尋求與俄羅斯的軍事結盟以平衡高加索地區亞美尼亞／亞塞拜然與亞美尼亞／土耳其兩組權力競爭，來自於區域威脅的挑戰自始是亞美尼亞主要考量，政治菁英的遞嬗過程並沒有改變此種基本格局，因此後續亞美尼亞開展與俄羅斯的能源合作、加入以俄羅斯爲主導的歐亞經濟聯盟，都是在這個框架下展開的。總結來看，自 1991 年起亞美尼亞即是從抗衡很快地轉向了安全避險的策略考量，請參閱圖 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7 亞美尼亞安全策略選擇變動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三) 烏克蘭：政治暴力（Political Violence）的策略轉變

在本文的三國研究中，烏克蘭是一個相對特殊的國家，影響烏克蘭安全策略選擇的主要因素既非經濟、也非領土，烏克蘭最重要的策略轉變來自於2004年的橙色革命（Orange Revolution）與2014年的2月革命（February Revolution），兩次革命讓前任總統（Kuchma 與 Yanukovych）安全政策無以爲繼，繼任者（Yushchenko 與 Poroshenko）重新調整策略方向，從而改變烏克蘭親歐或親俄的策略方向，從光譜的兩端來看，烏克蘭的安全策略轉型最爲極端，也最爲激烈。和前兩個國家不同，塞爾維亞與亞美尼亞的路線變動多爲外部因素與政黨競爭，然烏克蘭安全策略的變動主因爲內部革命所致。

革命是一種內部團體因資源分配或衍生的相對剝奪感，透過資源動員所採取的推翻政府行動。無論從烏克蘭內部資源的結構性分配或文化層次的對立局面來看，烏克蘭的確屬於政治暴力推翻舊有政權的重要案例，烏克蘭東／西部民眾對親歐或親俄態度不同，並以此產生對政府的不滿心理，這些對政府不滿的個人與團體採取各式抗爭行動、最終並引發成爲大規模的政治暴力行爲（Coupéa & Obrizan, 2016: 201-212）。

2004 年橙色革命爆發（也就是 Kuchma 親俄政權結束與 Yushchenko 親歐政權上台）的主因來自於烏克蘭民眾對境內貪腐的不滿與情感的投射表現，所以這個時期的烏克蘭仍在經濟避險與安全避險的兩個位置間擺盪。2014 年的 2 月革命以烏克蘭－歐盟聯繫協定（Ukraine-EU Associ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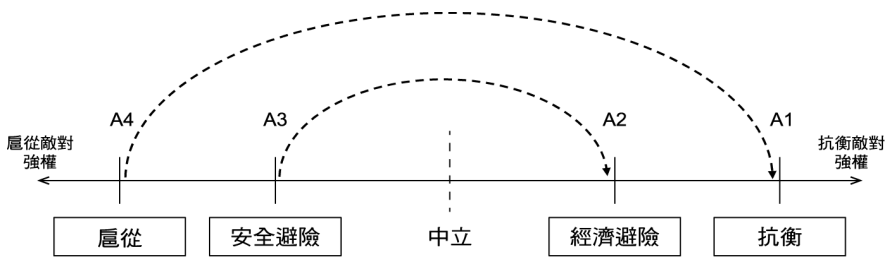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greement）簽署與克里米亞半島危機（Crimea Crisis）爲標記，親俄的 Yanukovych 避走俄羅斯，繼任的 Poroshenko 採取完全倒向歐盟的作法，代表烏克蘭再次出現親歐／親俄策略選擇出現重大變遷。

這些採取政治暴力的行爲者訴求針對該國國內貪腐問題、要求執政者以下台作爲懲罰貪腐的代價，並把抗議訴求對象擴及親歐或親俄選擇。這個將對外的安全策略選擇納入對內抗議貪腐現象的連結，是烏克蘭政治暴力過程一大特色，目的是希望藉由推翻前任執政者的方式，改變烏克蘭政策。從這一點來看，烏克蘭的安全策略選擇與經濟依賴、安全環境的關聯性較小，變動主要來自於內部社會分裂與因此產生的政治暴力行爲（Stoner & McFaul, 2013）。

所以總結來看，Kravchuk、Kuchma、Yushchenko、Yanukovych、Poroshenko 五任總統安全策略選擇大相逕庭，他們有明顯的親歐親俄傾向：Kravchuk 採獨立偏向親歐，Kuchma 因國內經濟困頓轉爲親俄，Yushchenko 因反俄與橙色革命（Orange Revolution）爆發而當選總統。Yanukovych 於 2010 年上台後調整政策決定親俄且拋棄與歐盟聯繫協定（Association Agreement）的簽署，後再因 2014 年爆發 2 月革命而下台，繼任的 Poroshenko 則是完全倒向親歐一邊（Solonenko, 2009: 709-731；Averre, 2009: 1689-1713），從光譜的兩側來看，烏克蘭的安全策略選擇變動呈現出一種在兩端激烈擺盪的現象，此種模式跳脫線性的轉變過程，與前兩種模式相異，請參閱圖 8。

圖 8　中小型國家安全策略選擇變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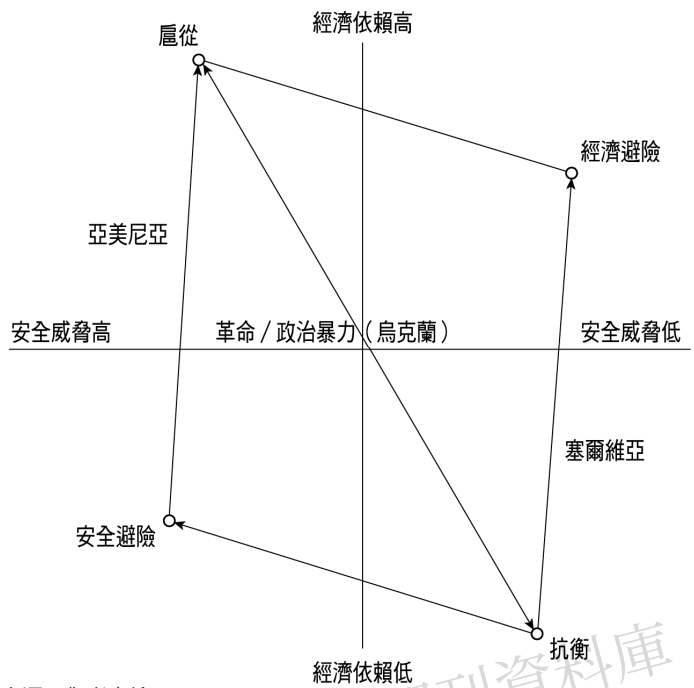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上述以塞爾維亞、亞美尼亞、烏克蘭爲主的三個中小型國家的安全策略變動模式，本文分別於線形圖上標記了這三國的變動軌跡，如果再把這些變動軌跡放在縱軸與橫軸的座標圖，將三種策略變動由線型圖轉化爲座標圖，可以得出一個更有特色的模型。在這個平面圖上以經濟依賴與安全威脅兩大指標出發，縱軸代表國家的對外經濟依賴程度，橫軸代表國家所受安全威脅程度分別標記。由於塞爾維亞 2006 年後原本採取親歐入盟策略選擇，然受經濟趨力影響轉而擴大與俄羅斯交流，所以是一種經濟避險的策略選擇。亞美尼亞因獨立初期與亞塞拜然的領土爭議而快速轉向俄羅斯，所以是安全避險優先，再擴大與俄羅斯的經濟整合，隨後採取扈從的策略。至於烏克蘭雖同受經濟與安全因素影響，然內部對立與政治暴力才是影響烏克蘭的主要變因所在，其變動軌跡是一種在抗衡與扈從間交互擺盪的模式，且後一次的擺盪還較前一次爲激烈。此三國塞爾維亞（經濟避險）、亞美尼亞（安全避險）、烏克蘭（政治暴力）策略選擇類型，請參閱圖 9。

圖 9　塞爾維亞、亞美尼亞與烏克蘭三國的安全策略路徑演變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模型與實踐：三國的策略轉變分析

從前文討論來看，本文觀察塞爾維亞、亞美尼亞與烏克蘭三國的策略選擇並以此開展出類型討論，以下幾點是本文的綜合討論：

(一) 個案研究的探討：影響塞、亞、烏三國策略選擇的因素分析

從政治菁英遞嬗、經貿交流與區域安全威脅三因素的分析層次來看，本文發現影響塞爾維亞採取經濟避險的安全策略選擇，其主要變因爲歐洲近年遭遇的經濟危機挑戰，此舉使得塞爾維亞擴大與俄羅斯經濟交流、並試圖開啓與俄羅斯的能源管線合作。最終天然氣南線計畫雖因故遭到擱置，不過這並不妨害塞、俄雙方開展其他領域的經濟合作。另外，無論黨派差異，塞爾維亞自 2006 年起歷任政治菁英皆保持親歐的策略選擇，在科索沃議題也與親歐政策保持一致。環顧巴爾幹半島地區，多數國家均爲北約與歐盟會員國，未加入北約與歐盟的國家也正往這兩大組織正式會員國方向邁進，所以塞爾維亞的安全政策選擇不大，僅能在有限的框架下發展與俄羅斯的經濟交流，因此影響塞爾維亞的主要變因來於經濟因素。惟塞爾維亞因經濟因素停留在經濟避險位置，並未向扈從俄羅斯方向移動，這主要是因爲與塞爾維亞最攸關的安全威脅來源爲科索沃問題，而科索沃問題的主要行爲者爲歐盟與北約。

影響亞美尼亞策略選擇的主要變因來自於鄰近的領土爭議與安全威脅，對亞美尼亞而言，納卡問題是將亞美尼亞推向扈從俄羅斯的主要因素，這個觀察可從高加索地區的俄羅斯－亞美尼亞－亞塞拜然三角關係來看，俄羅斯是俄羅斯－亞美尼亞－亞塞拜然戰略三角下羅曼蒂克型的樞紐角色，分別與兩個側翼保持友好關係（Shiriyev & Davies, 2013: 185-221）。這可解釋爲何亞美尼亞在獨立初期很快決定倒向俄羅斯一方的原因，而本文也發現無論是屬於泛亞美尼亞的國民運動或獨立派的 Levon Ter-Petrosyan、Robert Kocharyan、Serzh Sargsyan，這些執政菁英皆未變動亞美尼亞的親俄選擇，顯見親俄是亞美尼亞具高度共識的策略選項。而與俄羅斯的經貿交流更能凸顯出亞、俄雙方安全策略的關係：俄羅斯是亞美尼亞最重要的出口國，與俄羅斯的貿易量約占亞美尼亞年度貿易額的 28%，2017 年與俄羅斯的貿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易增長也高達了 26.1%，因此經濟交流因素呈現出一種強化雙邊關係的作用，使得亞美尼亞得以透過與俄羅斯加入歐亞經濟聯盟經濟整合而獲得更多出口市場與外資的誘因（Armenpress, 2018）。

影響烏克蘭策略選擇的主要變因來自於境內政治菁英的遞嬗過程，這裡可以很清楚的發現烏克蘭歷任總統的更迭就代表策略選擇對象的重新調整，而且 Kravchuk、Kuchma、Yushchenko、Yanukovych、Poroshenko 五任總統的策略轉變還顯示出擺盪模式特色，此種特色使得烏克蘭抗衡或扈從的策略選擇沒有固定對象（楊三億，2018：1-28）。經貿交流扮演依變項的角色非常明顯，2005 年與 2014 年是烏／俄關係重要節點，這兩個時期分別代表親歐的烏克蘭總統上台執政，這兩段時期烏／俄經貿交流也同步呈現衰退現象，相較於 2006 年至 2013 年出口平均值，2015 年烏對俄出口總值約下滑了 24.7%，烏克蘭損失了將近四分之一的俄羅斯市場（The Economist, 2015），這也造成烏克蘭區域安全威脅來源的對象不斷變動，難以確認烏克蘭抗衡或扈從對象，請參閱表 4。

表 4　塞爾維亞、亞美尼亞、烏克蘭三國策略選擇的因素分析

	政治菁英遞嬗	經貿交流	區域安全威脅
塞爾維亞（經濟避險）	無關（不同政黨歷任總理路線均極為相似）	歐債危機與天然氣管線誘因開啓與俄羅斯的經貿交流	受科索沃等區域影響因子，塞爾維亞區域安全議題有賴歐盟與北約支持
亞美尼亞（安全避險）	因區域安全問題而倒向俄羅斯，且路線確定後形成穩定的路徑發展	經貿交流作為支撐倒向俄羅斯策略選擇的工具，以此獲得亞美尼亞市場與外資來源	納卡問題乃影響亞美尼亞政治精英策略選擇的主要因素
烏克蘭（政治暴力）	政治菁英遞嬗是影響烏克蘭策略選擇主因	經貿交流受策略變動影響，與俄羅斯／歐盟經貿交易變動量大	受策略影響不斷變動之故，區域安全威脅對象難以確認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伍、結論

一、難以長期維繫的避險策略

避險策略通常是中小型國家天生選項，從模型角度來看，越往避險方向發展，中小型國家越可能可避免選邊站的風險，若干中小型國家的經驗說明了靈活彈性的策略選擇有助於從聯盟強權與對抗強權獲得誘因，此種策略選擇也合乎多數人的直觀理解。不過相對的，中小型國家雖然有選擇避險的天然傾向，但鄰近強權則採取截然不同的態度，強權對這些中小型國家多有政策目標，其政策以誘因、施壓或強硬武力方式爲之。無論是誘因或施壓，強權透過優惠性貿易待遇條約或政策性援助等各方式，皆可能衝擊到國家內部既有的利益團體，這些利益團體或政黨將這些誘因或壓力轉向執政當局、企圖推動國內政策的轉型，本文觀察到歐洲東部的烏克蘭即爲此例。烏克蘭在歐俄雙方競相提供優惠條件、加大壓力的情況下，該國雖曾嘗試透過採取歐俄相對等距的策略以保持政策獨立，然在歐盟與俄羅斯不斷施加壓力的情況下，烏克蘭終無法維持左右逢源的避險立場，這個結果說明雖然避險可能是中小型國家的首選策略，但要能長期在左右強權競爭下維持平衡，難度甚高。

二、內部因素與策略調整

強權的誘因與國內因素對中小型國家策略選擇產生影響，對中小型國家來說，強權施壓與內部政治力量互動關係，是策略選擇的均衡點所在，強權透過誘因給予或施壓目標國期望改變策略，而目標國國內的眾多政治力量則透過體制內的選舉或體制外的群眾運動等方式以企圖維持或改變政策，所以策略的調整就是一種內外壓力均衡點表現。屬於前蘇聯地區的中東歐與高加索若干國家境內眾多民族共處，宗教、語言和文化也各自相異。在此種國內基本共識互信不足的情況下，定期選舉與其他原先設計成解決民族紛爭的各式合法性的民主機制也難以運作，此種內外壓力激盪的結果，暴力方式解決歧見難以避免。從內部因素來說，民主化程度與中小型國家的策略選擇因此產生關聯，從模型來看，革命手段雖是解釋這些國家安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策略轉型的重要因素，但革命手段卻無助於國內政策歧見的最終解決，尤有甚者，革命的爆發同時也爲將來潛在衝突預埋導火線。

三、地緣因素與策略選擇類型

地緣政治從來都是影響國際政治發展的重要變因，對中小型國家來說更是如此，與強權的距離遠近或強權是否願意跨越地緣障礙、推動政策目標，對這一群國家的影響力量相當明顯。本文的個案研究：塞爾維亞、亞美尼亞、烏克蘭分別代表巴爾幹半島、高加索與東歐三個次區域，從地緣政治角度來說，亞美尼亞離俄羅斯最近、離歐盟最遠，因此受到俄羅斯較多的影響力量，地緣政治效應明顯；烏克蘭爲歐俄兩大勢力競爭的中間地帶，烏克蘭又是前蘇聯地區土地面積最大、人口最多的前蘇聯加盟共和國，歐俄雙方對烏克蘭施加的壓力也最大，東部夥伴、聯繫協定、關稅同盟、歐亞經濟聯盟等各式來自歐盟與俄羅斯的壓力，皆可發現這些政策工具運用於烏克蘭領土。塞爾維亞爲靠近歐盟的巴爾幹半島國家，塞爾維亞被歐盟候選國所圍繞的此一地緣特色使得塞爾維亞的策略選項漸次縮小，從跨國的經貿交流、人員移動，再到能源管線的鋪設，塞爾維亞頗受歐盟侷限，目前雖在經貿議題上開展與俄羅斯交流，惟此種交流仍難以突破框架。

綜合來看，本文所討論個案雖有不同，但這些個案與鄰近地區國家未來走向皆同樣令人關注。本文的觀察是，高加索地區的亞塞拜然與東歐的摩爾多瓦，這兩國的策略選擇與塞爾維亞的經濟避險模式較爲相近，他們多在親歐策略下開展與俄羅斯有限度的經濟交往，但主軸仍是與歐盟的密切合作。東歐的白俄羅斯與亞美尼亞的安全避險相似程度高，雙方都先與俄羅斯締結緊密的軍事合作關係，再逐步深化經濟合作、推廣至歐亞經濟聯盟的政經整合，此種軍事爲先的整合模式將使得兩國與俄羅斯保持相當緊密的聯盟關係。

四、經濟避險與安全避險的定錨效果

從本文的討論核心，也就是中小型國家的經濟避險與安全避險的策略選擇視野來看，經濟避險代表這一群國家因利益而採取的政策調整作爲，這是一種理性的趨利行爲，不過理性的趨利行爲根基並不穩固，在本文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討論過程中，存在外部誘因競爭者這一因素的條件限制，使得中小型國家的策略選擇出現替代方案，存在外部誘因的競爭提供者使得中小型國家得以轉移扈從對象以取得補償利益，所以經濟避險的政策定錨效果並不明顯。相對的，安全避險則因威脅來源明確，中小型國家對領土與國防安全的威脅認知不易改變，因此安全避險的策略選擇具有定錨作用，較易形成路徑依賴效果。

最後，除美中俄等國外，多數國家都屬於權力結構下的中小型國家，這一類國家的安全研究兼具重要學術意涵與實務參考價值，值得臺灣投注更多心力於相關層次的研究之上。本文認爲中小型國家安全策略具多樣化特色，此種特色符合當前不斷變動的國際局勢，從研究結果來看，中小型國家爲求生存於強權相互競逐的惡劣環境下，策略選擇的變動乃是常態，中小型國家透過不斷檢視自身的安全環境方式，隨時調整與強權的親疏遠近關係、從而決定策略方向，此種靈活變動的選擇模式實際上是中小型國家拓展本國生存環境的最佳策略。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吳玉山，1997a，〈抗衡或扈從：面對強鄰時的策略選擇（上）〉，《問題與研究》，36(2): 1-32。Wu, Yu-Shan. 1997. “Kangheng huo huzong: miandui qianglin shi de celüe xuanzeshang” [The Choice of Strategy toward one’s Strong Neighbor: Balancing or Bandwagoning, part I]. *Issues and Studies* 36(2): 1-32.

吳玉山，1997b，〈抗衡或扈從：面對強鄰時的策略選擇（下）〉，《問題與研究》，36(3): 61-80。Wu, Yu-Shan. 1997. “Kangheng huo huzong: miandui qianglin shi de celüe xuanzexia” [The Choice of Strategy toward one’s Strong Neighbor: Balancing or Bandwagoning, part II]. *Issues and Studies* 36(3): 61-80.

楊三億，2012，〈誘因政策與民主化過程：以塞爾維亞爲例〉，林碧炤、鄧中堅（主編），《金磚國家俄羅斯及歐亞地區研究》，臺北：五南出版社，頁 221-261。Yang, San-yi. 2012. “Youyin zhengce yu minzhuhua guochen: gyi seerweiya weili” [Incentives and Democratization: The Case of Serbia]. In *Jinjhuan guojia eluosih ji ouya dicyu yanjiou* [*Brics, Russia and Eurasia*], eds. Lin, Bi-Jiau & Chung-chian Teng. Taipei: Wu-Nan Publisher, 221-26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楊三億，2017，〈歐洲中小型國家安全政策：策略選擇與轉型〉，《問題與研究》，56(2): 31-66。Yang, San-yi. 2017. “Ouzhou zhongxiaoxing guojia anquan zhengce: celue xuanze yu zhuanxing” [Security Policies of European Medium and Small States: Choices and Transformation]. *Issues & Studies* 56(2): 31-66.

楊三億，2018，〈烏克蘭安全策略選擇：內部因素分析〉，《問題與研究》，57(1): 1-28。Yang, San-yi. 2018. “Wukelan ancyuan syuan: celue xuanze neibu yinsu fenxi” [Ukraine’s Security Strategic Choices: A Domestic Perspective]. *Issues & Studies* 57(1): 1-28.

趙竹成，2017，〈徘徊在歸附與自決之間－烏克蘭東部與克里米亞的選擇〉，洪泉湖（編），《當代歐洲民族運動》，臺北，聯經出版社，頁 101-128。Zhao, Zhu-cheng. 2017. “Paihuai zai guifuy u zijue zhijian: wukelan dongbu yu kelimiya de xuanze” [Lingering between Amalgamate and Self-determination: Crimea and Ukraine East]. In *Dang dai on jhou min zu dung* [*Modern European National Movements*], ed. Hung, Chuan-hu.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101-128.

薛健吾，2016，〈抗衡或扈從：14 個歐亞國家對俄國外交政策選擇的再檢視〉，《東吳政治學報》，34(3): 121-178。Hsueh, Chien-Wu. 2016. “Kangheng huo huzong: shisige ou ya guojia dui eguo wai jiao zheng ce xuan ze dezai jianshi” [To Balance or to Bandwagon? Revisiting the Fourteen Newly Independent States’ (NISs) Foreign Policy Choices toward Russia, 1992-2009]. *Soochow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4(3): 121-178.

魏百谷，2012，〈烏克蘭與俄羅斯經貿關係的變遷與展望〉，《台灣國際研究季刊》，8(3): 99-117。Wei, Bai-ku. 2012. “Wukelan yu eluosi jingmao guanxi de bianqian yu zhanwang” [Trends and Perspectives in Ukrainian-Russian Trade and Economic Relations]. *Taiw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8(3): 99-117.

二、西文部分

Ananicz, S. 2013. “Armenia Turns Away from EU.” in https://www.osw.waw.pl/en/publikacje/analyses/2013-09-04/armenia-turns-away-eu. Latest update 19 September 2018.

Armenpress. 2018. “Armenia-Russia trade turnover increases by 26.1%.” in https://armenpress.am/eng/news/923310.html. Latest update 19 September 2018.

Averre, D. 2009. “Competing Rationalities: Russia, the EU and ‘Shared Neighbourhood’.” *Europe-Asia Studies* 61(10): 1689-171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ydin, M. 2004. “Foucault’s Pendulum: Turkey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 *Turkish Studies* 5(2): 1-22.

Baev, P. & I. Overland. 2010. “The South Stream versus Nabucco Pipeline Race: Geopolitical and Economic (ir)Rationales and Political Stakes in Mega-projects.” *International Affairs* 86(5): 1075-1090.

Brzezinski, Z. & P. Sullivan. 1997. *Russia and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Documents, Data, and Analysis*.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oupéa, T. & M. Obrizan. 2016. “Violence and Political Outcomes in Ukraine-Evidence from Sloviansk and Kramatorsk.”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44(1): 201-212.

European Commission. 2016. “Serbia 2016 Report, 2016 Communication on EU Enlargement Policy, Brussels, 9.11.2016 SWD (2016) 361 final.” in https://ec.europa.eu/neighbourhood-enlargement/sites/near/files/pdf/key_documents/2016/20161109_report_serbia.pdf.Latest update 19 September 2018.

European Commission. 2017. “*European Union, Trade in Goods with Serbia*.” in https://webgate.ec.europa.eu/isdb_results/factsheets/country/details_serbia_en.pdf.Latest update 19 September 2018.

Falkowski, M. 2015. “Protests in Armenia as a Manifestation of the State’s Systemic Crisis.” in https://www.osw.waw.pl/en/publikacje/analyses/2015-07-01/protests-armenia-a-manifestation-states-systemic-crisis. Latest update 19 September 2018.

Frost, A. 2009. “The Collective Security Treaty Organization,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nd Russia’s Strategic Goals in Central Asia.” *China and Eurasia Forum Quarterly* 7(3): 83-102.

Global Edge. 2018. “Serbia: Trade Statistics.” in https://globaledge.msu.edu/countries/serbia/tradestats. Latest update 19 September 2018.

Harutyunyan, A. 2009. *Contesting National Identities in an Ethnically Homogeneous State: The Case of Armenian Democratization*. Doctoral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Western Michigan, Kalamazoo, MI.

Hey, J. 2003. *Small States in World Politics: Explaining Foreign Policy Behavior*.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Joenniemi, P. 1998. “From Small to Smart: Reflections on the Concept of Small States.” *Irish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9: 61-62.

Kang, D. C. 2009. “Between Balancing and Bandwagoning: South Korea’s Response to China.”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9: 1-2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Koyama, Y. 2016. *The Eurozone Enlargement: Prospect of New EU Member States for Euro Adoption*.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Larson, D. W. 1991. “Bandwagon Image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Myth or Reality?” In *Dominoes and Bandwagons: Strategic Beliefs and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n the Eurasian Rimland,* eds. Robert Jervis & Tack Snyd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85-111.

Maki, J. M. 2008. “EU Enlargement Politics: Explaining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Conditionality of ‘Full Cooperation with the ICTY’ towards Western Balkans.” *Politička misao* 45(5): 47-80.

Mirzoyan, A. 2010. *Armenia, the Regional Powers, and the West: Between History and Geo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Osipian, A. L. & A. L. Osipian. 2012. “Regional Diversity and Divided Memories in Ukraine: Contested Past as Electoral Resource, 2004-2010.”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26(3): 616-642.

Raska, M. 2016. *Military Innovation in Small States: Creating a Reverse Asymmetry*. London: Routledge.

Rieber, A. 2015. “Struggle over the Borderlands.” *Explorations in Russian and Eurasian History* 16(4): 951-959.

Schweller, R. 1994.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1): 72-107.

Shiriyev, Z. & C. Davies. 2013. “The Turkey-Armenia-Azerbaijan Triangle: The Unexpected Outcomes of the Zurich Protocols.” *Perceptions* 18(1): 185-221.

Solonenko, I. 2009. “External Democracy Promotion in Ukraine: the Role of the European Union.” *Democratization* 16(4): 709-731.

Stoner, K. & M. McFaul. 2013.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Suny, R. G. 1993. *Looking Toward Ararat: Armenia in Modern Histo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Sweeney, K. & P. Fritz. 2004. “Jumping on the Bandwagon: An Interest-Based Explanation for Great Power Alliances.” *Journal of Politics* 66(2): 428-449.

Szpala, M. 2014. “Russia in Serbia-Soft Power and Hard Interest.” *Centre for Eastern Studies* 150: 1-8.

The Economist. 2015. “Russia Suspends Free Trade with Ukraine.” in http://country.eiu.com/article.aspx?articleid=1803787164&Country=Ukraine&topic=Politics&subtopic=Forecast&subsubtopic=International+relations&u=1&pid=1967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60780&oid=1967360780&uid=1. Latest update 7 December 2018.

The World Bank. 2006-2016a. “Serbia GDP Growth.” in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ZG?locations=RS.Latest update 7 December 2018.

The World Bank. 2006-2016b. “Armenia GDP Growth.” in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ZG?locations=AM. Latest update 7 December 2018.

The World Bank. 2006-2016c. “Ukraine GDP Growth.” in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ZG?locations=UA. Latest update 7 December 2018.

Vaicekauskaitė, M. 2017. “Security Strategies of Small States in a Changing World.” *Journal on Baltic Security* 3(2): 7-15.

Walt, S. 1985.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9(4): 3-43.

Walt, S. 1987.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Waltz, K.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Addison-Wesley.

Wu, Shang-su. 2016. *The Defence Capabilities of Small States: Singapore and Taiwan's Responses to Strategic Desperatio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Zaccaria, B. 2016. *The EEC's Yugoslav Policy in Cold War Europe, 1968-1980*.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Security Strategies and Path Development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States:

Case Studies of Serbia, Armenia and Ukraine*

*San-yi Yang***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larify small and medium states' (SMSs) security strategies in the face of global power competition. It tries to explain SMSs' versatile security choices between balancing and bandwagoning and analyses their path development. First,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shift from balancing to bandwagoning is based on the effect of "hedging for profit," which depicts the importance of economic dependency. Second, "hedging for security" is also the author's idea for explaining why SMSs re-adjust their policies, and it explains the balance of threat. Finally, the changes in some SMSs' security choices may not come from external factors; instead, political violence or revolution from within is another major factor in explaining causal relations. This article uses the cases of Serbia, Armenia and Ukraine as reference points for delineating different path developments.

Keywords: Small and Medium-Siz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ies, Serbia, Armenia, Ukraine

---

* DOI:10.6166/TJPS.201812_(78).0004

**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E-mail: sanyiyang@nchu.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